

蘇瑩輝著

敦

煌

論

集

江北中題



台灣學書局印行

蘇瑩輝

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煌煌藏书章

論集

江北申題

台灣學生書局印行

敦煌論集

著者：蘇

瑩

輝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配證字號

發行人：丁

文

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定價：精裝新臺幣二二〇元
平裝新臺幣一七〇元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修訂三版

序

余好談中西交通之史實，而足未履河西走廊，更未逾玉門，陽關，何論敦煌？嘗引以爲憾焉！然中外學人，凡有述及敦煌之作，或鉅著，或短文，輒愛讀不忍釋手，蓋欲藉他人之所見所聞，以補余所未見未聞。夫以世界之大，縱交通發達如今日，而吾生有涯，豈能一一親臨吾所嚮往之地？無已，則惟乞諸往昔之紀錄，與並世諸賢之研考，學問之道，殆皆類是。

丹徒蘇瑩輝先生，爲人樸實，治學謹嚴，學人也，亦君子人也；相交以還，益深欽敬。雖訥訥不善言辭，而真摯誠篤，有一面之緣者，當無不有親切之感。先生嘗供職於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於瓜沙之建置與沿革，石窟之封閉與重啓，雕刻之特徵，壁畫之源流，與夫寫本經卷之統計，瞭若指掌，蓋非如先生之寢於石室，饋於石室，歷年餘之久者，曷克有此？故當其「敦煌學概要」於民國五十三年與世人之共見也，一時治斯學者無不人手一冊，以其源源本本，詳實簡明，爲前所未有的也。比年講學南服，罕讀其文；客歲，同出席密西根之國際東方學家會議，相見甚歡，傾談之餘，乃覺其爲學之猛進，至足驚人。今夏，余本擬作吉隆坡之遊，方冀班荆道故，重敘往事，而終未成行；彼時，先生輯近作「敦煌論集」，交學生書局印行，索序於余。

余維六七十年來，我國史料上之重大發現有四：曰殷墟甲骨，曰流沙墜簡，曰敦煌經軸，曰內閣舊檔，其附屬之石器、陶器、銅器、壁畫、古籍等，無一非稀世之寶，於學術之貢獻至鉅，而敦煌之材料獨富：失傳典冊之重現，錯簡訛字之校正，上古人種遷徙途徑之確定，東西往來路線之證實，六朝至五代藝術之演變，佛、道、摩尼與景教文物之大量出現，以及若干死文字之終於可解可讀，其有裨於學術，蓋曠古所未有。宜乎東西學者，雖埋首數十年，而可發掘之材料，待解決之問題，仍不在少。

或以爲「敦煌學」一名詞不能成立，其甚者且欲並「漢學」（或譯中國學，或譯華學）一名詞而棄之。余以爲名詞之爲物，本約定俗成，「漢學」（Sino'logy）一詞，販自泰西，近稱「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較爲切實；顧「中國研究」浩如烟海，分類愈細，則研究愈專，研究愈專，則所得愈精，誠如是，則稱某某學，某某研究，或更可以促進學人之重視，分工合作，反對云何哉！古人謙稱爲人作序曰「佛頭著糞」，若用之於此序，則寫實而非謙稱矣！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一屆華學會議前夕杰人方豪謹序

敦煌論集目錄

一、通論

國際漢學界與敦煌學·····	一
談敦煌學·····	九
北平圖書館與敦煌學·····	三七
敦煌學與圖書館學·····	四九
敦煌發現藏經之謎·····	五三
敦煌學在日本·····	六三
我如何寫「敦煌學概要」·····	九五

二、專論

論敦煌本史傳變文與中國俗文學·····	一〇一
敦煌石室和敦煌千佛洞·····	一三九

敦煌的壁畫藝術·····	一四五
敦煌壁畫石室發現對中國繪畫之影響·····	一五三
中國彩塑藝術之特徵·····	一九九
論唐時敦煌陷蕃的年代·····	二一五
再論唐時敦煌陷蕃的年代·····	二二一
張義潮·····	二三一
補唐書張淮深傳·····	二四三
曹元忠卒年考·····	二五三
瓜沙史事系年·····	二六三
北魏寫本孝經殘葉補校記·····	二八三
六朝寫本毛詩注殘葉辭記·····	二九七
敦煌寫本國語解殘卷·····	三〇一
敦煌所出北魏寫本曆日·····	三〇五
中外敦煌古寫本纂要·····	三〇九

敦煌藝文略

三四三

跋敦煌岷州廟經幢殘石

三九一

跋唐宣宗賜沙州僧政勅

三九五

敦煌新出泰始十一年樂生碑跋

四〇三

陳著「燉煌寫本洪習悟真等告身校注」

四〇五

跋莫高窟造像及功德題名石刻拓本

四一三

論敦煌資料中的三位河西都僧統

四一五

敦煌翟家碑時代考

四二七

略論沙州歸義軍節度使領州沿革

四三五

三、書評

評勞幹著「敦煌藝術」

四三九

簡評巴宙輯「敦煌韻文集」

四四五

國際漢學界與敦煌學

一

近十多年來，關於討論「漢學」或「漢學家」的文章和會議，無論在國內或海外，我們都時有所聞。

就後者言，國際上有一個「國際東方學者會議」，又有一個「青年漢學家會議」；九年前自由中國曾派李濟、張貴永、方豪三位教授到西德參加此兩個會議。比較廣汎地說，例如一年一度的「美洲亞洲學會」年會，「國際語言學者會議」以及一九六〇年在馬尼拉創始之「亞洲史學家會議」等，皆曾涉及有關「漢學」方面的問題。就前者言，民國四十七年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在臺北南港例行的一次講論會上，曾討論到所謂「漢學」和「漢學家」的問題。這次會議由石璋如先生主席，主講者爲周法高先生。會中李濟博士曾發言，他不承認有所謂「漢學」，而認爲只有語言學、歷史學、考古學、文學、哲學等等的研究。他說：「譬如趙元任先生吧！我們只知道他是第一流的語言學家，不是漢學家。」五

十二年六月，周氏又發表了一篇以「何謂漢學」爲題的文章，於「漢學」的名稱、涵義、範圍皆有闡釋。

還有報導世界各國漢學研究的論文，如梁容若先生的「日本的漢學研究」，宋晞先生的「美國的漢學研究」（思想與時代雜誌一〇一期，民國五十一年，臺北出版），楊聯陞先生的「歐美東洋研究之現狀與展望」（載「史泉」第二十五號，昭和三十七年日本出版），周法高先生的「論歐美漢學研究的趨勢」，「談日本二大學的漢學陣容」（載漢學論集頁二八及頁六四，民五三，臺北正中書局出版）；陶振譽先生的「日本學人對中國史的研究」，費海璣先生的「法國漢學研究」（二文並載「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民五一，臺北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等，均甚翔實。至於專談美國各大學有關中國課程的，除了宋晞先生在「美國的漢學研究」一文中根據華美協進社一九五六年報告所述實況外，還有周法高先生的「談美國數大學有關中國的課程」（載新天地二卷十一期，臺北出版）、「續談美國數大學有關中國的課程」（見漢學論集頁五五，民五三，臺北正中版）以及楊富森先生的「美國各大學中的中國語文課程」（載新天地四卷十二期，民國五十五年二月出版）、「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載「書和人」第二十八期，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國語日報副刊）等文。論述「漢學」和「漢學家」諸問題的專書，則有周法高先生的漢學論集（連附錄共計一九六頁，民五三年五月，臺北出版）。

據我近年來在報章雜誌上看到國內外專家關於國際漢學趨勢的報導，歸納起來，至少有後面的幾種現象：

1. 「漢學」研究工作的分工，日趨精細，一掃過去漢學界籠統的作風。
2. 中國學者在歐、美漢學研究的比重逐漸增加。
3. 研究重點向上延展。例如美國人對於研治「中國近代史」和現代研究的狂熱，幾乎達於極點。然而物極必反，同時近年已經感覺到光了解近代是不够的，何況歐洲與日本學者們已猛着先鞭，並不囿於「近代史」和「現代中國」的狹義範圍！所以美國漢學研究的重心，逐漸地已由清代而上推到明代和宋代了。

4. 「漢學」各部門研究，在方法和理論上，隨各該普通學科的發展而有變化。例如考古學、語言學、歷史學、哲學、文藝批評、經濟學等科，在這二三十年內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就美國漢學界言，這幾年，正注重於制度史的研究。一九六〇年鄧嗣禹等所著的「清代行政之研究」一書序文中，曾特別提到應注重傳統的中國政府制度的研究。在明史方面，例如賀凱 (Charles O. Hucker) 曾在哈佛亞洲學報二十一卷發表了「明代的政府組織」一文。在宋史方面，例如史丹福大學教授

劉子健等，也有研究宋代制度的論文。哈佛大學教授楊聯陞也出版了「中國制度史研究論文集」，包括自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七年所著的論文，討論中國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問題。

至於漢學界的代表人物如何評選？周法高、楊富森二氏在他們的文章裏已有所論述，本文恕不置評。現在我所要談的是「敦煌學」在國際漢學界的研究比重。

我們知道敦煌石室寶藏的發現，是六十五年以前的事；「敦煌學」成爲一個名詞，是近三十多年的事；「敦煌學」成爲國際漢學家們所公認的一門顯學，則是近二十年的事。在歐、美，「敦煌學」的普遍被重視，已是有目共覩。在日本，尤其是近幾年來，可謂風靡東瀛！我們從研究論著的出版，文獻資料的影印，以及複製品的展覽各方面來看，無論在京都或東京，幾乎每年都有新的表現。

敦煌石室發現後的歷代卷軸（包括寫經、絹畫等等）被外人輦走的數量，日本至多居於第三位；然而近十餘年來，日本學人研治「敦煌學」的風氣，遠在英、法諸邦之上；尤其是他們研究工作的分工很細，而且研治這門學問的人也很普遍，不像歐洲大陸只是把重心聚集於一兩位老輩的身上。並且他們還設有機構（如京都有「西域文化研究會」，東京有「敦煌文獻研究連絡委員會」從事策動研究。

三

關於「敦煌學」在國際漢學界的研究比重，我們只須就周法高氏在漢學論集裏所舉的漢學代表人物

中，仔細端詳一下，即見分曉。

歐美漢學界的代表——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生於一八九四年；他是法國漢學大師沙畹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和梵文大師烈維 (Sylvain Levi, 1863—1935) 的弟子，對佛典文學有特殊的貢獻。他對中國語言、文學都很有研究，在「通報」(T'oung Pao) 上發表的文章很多，為法蘭西學院教授，現在主講「敦煌俗文學」。

英國漢學界的代表——魏蕾 (Arthur Waley)，一八八九年生，著有中國歷代文學家李白、白居易、袁枚等傳記多種，譯著尤多（著名的如詩經、論語、老子、唐詩，還有西遊記的節譯）。關於「敦煌學」方面，輯有「敦煌變文集」及「英國博物院藏敦煌卷子目錄」等。魏氏對繪畫亦有研究，曾著「中國畫研究導論」，與英國博物院之戴維德爵士，及瑞典喜龍仁 (Oswald Siren) 教授，同為中國繪畫之愛好者，而戴氏的收藏尤富。

日本漢學界的代表——吉川幸次郎，一九〇四年生，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教授。他的博士論文為「元雜劇研究」，乃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以後最佳之概論作品。吉川氏雖不專治「敦煌學」，但他是狩野直喜博士的高業弟子；狩野博士在彼邦「敦煌學」方面的貢獻，不亞於我國羅振玉在「敦煌學」方面的貢獻。

中華民國漢學界的代表——胡適，周氏原文裏說：「胡先生在中國思想史、白話文學史、小說考證

諸方面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所可惜的是：他的巨著「中國思想史」始終尚未完成。而他也沒有能收到一位得意弟子來傳他的衣鉢。」筆者認為胡先生對「敦煌學」的倡導之功是不可沒的！固不僅利用敦煌卷子來考證神會和尚而已。我們知道民國初年，鄭西諦，劉半農等的提倡中國俗文學（利用敦煌卷子中的變文、俗講資料），胡先生也是其中的有力分子。

香港漢學界的代表——錢穆，周氏原文說：他對先秦諸子年代的考訂，對中國通史的貢獻，對中國思想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我們知道錢先生雖不專研「敦煌學」，然而他對先秦諸子的校勘考訂工作上，是很能利用敦煌資料的。

中國學者在歐美漢學界的代表——楊聯陞，周氏原文稱：「楊先生的博學已如前述，他對中國經濟史的貢獻，也是不可磨滅的。至於在大陸上當以陳寅恪先生為代表，已如前述。」筆者按：陳先生的造詣，誠如周氏所論，決不差於戴密微、吉川幸次郎二人。不幸的是：他有關佛典比較文學的多沒有寫了出來。而他又不敢收弟子，所以他的南北朝隋唐史尚可望有傳人，而佛典比較文學，在中國方面真成廣陵散了。並且有人說，陳先生還是用「敦煌學」這個名詞（在中國書刊中）的創始人呢！

四

從上面的這段論述中，「敦煌學」在國際漢界所佔的分量，已能給我們一個概括的印象。現在我們

看看「敦煌學」在中華民國發展的情形。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報導：

(甲) 敦煌文獻資料：除了臺灣各文教機構（如大學研究所、圖書館、博物館等）所藏的零星印刷品外，民國四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以美金一萬元委託日本東洋文庫，轉洽英國博物院，購得該院所藏敦煌卷子（繪品及繡件除外）的全部縮印本（用顯微膠卷Microfilm沖印後裝訂成冊），存於臺北縣南港鎮該所，供中外學人之研究。

(乙) 敦煌壁畫的複製：國立歷史博物館於民國四十五年在臺北市南海路該館，邀請羅吉眉、胡克敏諸先生設計複製了一所「敦煌壁畫室」，雖說是具體而微，但曾獲致中外人士的好評。

(丙) 出版刊物：除散見於各雜誌、學報之單篇論文外，專書方面，屬於報導性質的，如四十七年出版的「敦煌藝術」（勞幹著，歷史文物叢刊之一），五十三年出版的「敦煌學概要」（蘇瑩輝著，中華叢書之一）。屬於專題研究的，如五十一年五月出版的「關於敦煌藏經洞的幾個問題」（石璋如著，慶祝朱家驊先生七十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出版）。五十二年一月出版的「瓜沙史事系年」（蘇瑩輝著，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出版），五十三年一月出版的「榆林窟壁畫研究報告」（羅寄梅著，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出版）等。

(丁) 壁畫複製品展覽：五十三年三月杪，羅寄梅、劉先夫婦應教育部之邀請，將其參加一九六四——六五紐約世界博覽會的敦煌壁畫臨本八十幅，在其陽明山別墅公開預展，贏得觀者一致讚賞。

(戊) 研究機構：我國高等學府之有「敦煌學導論」的課程，創始於抗戰期中的西南聯大（設昆明），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五十二年秋，設於臺北陽明山華岡的私立中國文化學院研究所，增開「敦煌藝術」課目。翌年三月二十七日，該院創設敦煌學研究所於華岡，該所成立會上，張其昀先生以董事長的身份至辭，強調「敦煌學」的重要性，並期望實現1. 敦煌文庫，2. 敦煌畫室，3. 敦煌展覽，4. 輯印敦煌叢書，5. 編印敦煌學報，6. 複印敦煌圖片等計劃。此外，國立政治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所，亦於五十四年十一月起，增開「敦煌變文研究」課程。這些都象徵「敦煌學」的普遍被重視！

我寫這一篇文章的用意，除了把「敦煌學」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向讀者們報導外，並且希望國內研治這一門學問的人，能够利用現有的資料，加以整理鑽研；把握住時間，鼓起邁進直追的勇氣，總有迎頭趕上的一天。

我們知道敦煌卷軸的精華，全在歐洲；表達敦煌藝術體系的壁畫和彩塑，全在中國大陸；亞洲國家從事於「敦煌學」研究最熾熱的，又莫過於日本。以我們的才智，單就英、法、日三國已發表的敦煌資料而言，即足夠我國人的潛研冥索，何況我們還具備了豐富的相關資料？所以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千萬不要自餒！

談 敦 煌 學

清季以還，我國學術上的新發現，層出不窮。其中尤以殷墟甲骨、流沙簡牘、敦煌卷軸、大庫書檔四者富於史料上的價值。而敦煌和安陽兩處所發現的文物，經晚近中外學者的潛研；歷四十餘年的時間，也就蔚爲顯學，乃至成爲一個名詞——「敦煌學」和「甲骨學」。

在甲骨文字被發現的前後，各地出土的青銅器（也就是商、周時代的彝器）無論質和量，都很可觀。在敦煌卷軸被發現的前後，各地書鋪經售和私家流出的宋、元以來刻本圖書，它的數量更爲驚人。這兩宗發現，爲什麼不把它列入四大發現之內？我的答案是：商器的銘文字數太少。周器的銘辭雖較豐富（如毛公鼎的銘文，有五百個字之多），但其內容多已見於史籍（如尙書、春秋等）記載，不像甲骨刻辭裏蘊藏新史料的那樣多。至於宋版書，自上曆朝內府祕藏，下至坊間流傳，因爲刻印的部數多，所以存量也多。元以後的刊本，那就更不用說了。宋版書的可貴，主要的是錯字較少，所以後來的仿刻（遞鈔）之本皆要取正於此。敦煌石室裏貯藏的寫本卷子，不但絕大多數可以斟正宋、元刊本的譌誤，而且